



中国考古学百年
China's Archaeology in the 100 Years

神秘的 水滸王庄 水滸王庄

The Mysterious Ancient State of Shui



主 编：叶杨、张跃辉、王毅
编 委：李龙章、周雄伟、欧菲、周欣、吴维羲、朱亚蓉、王方、刘珂
图 片：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供稿
责任印制：王少华
责任编辑：张广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 / 深圳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编.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4

ISBN 978-7-5010-2757-6

I. 神… II. ①深… ②四… ③成… III. 巴蜀文化—文化遗址—图录 IV. K871.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7584号

神秘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

编 者：深圳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出版发行：文物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网 址：<http://www.wenwu.com>

邮 箱：web@wenwu.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8

印 张：27.5

版 次：2009年4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0-2757-6

定 价：320.00元

神
秘
的

古蜀王国

The Mysterious Ancient State of Shu

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
Cultural Relics from Sanxingdui and Jinsh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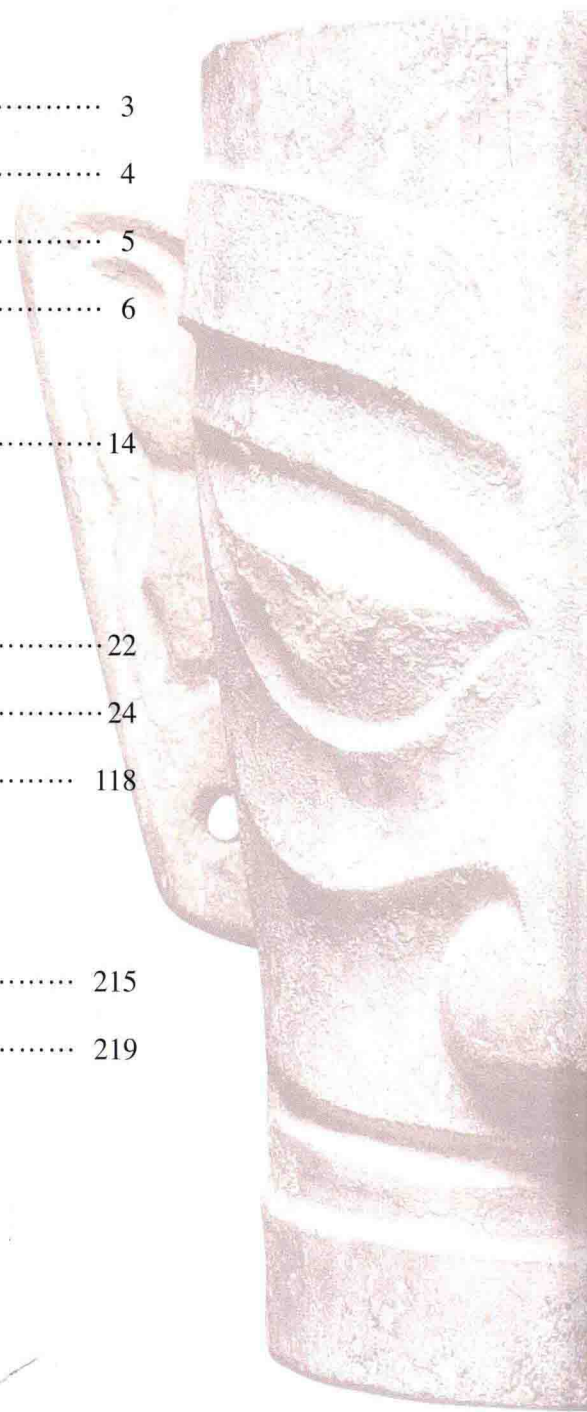


文物出版社



目录

序〔一〕	3
序〔二〕	4
序〔三〕	5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6
古蜀都邑——金沙遗址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14
珍宝图版	
震撼发现——揭开神秘古蜀王国的历史面纱	22
三星映日——三星堆时期古蜀王国神庙秘宝	24
金沙神韵——金沙时期古蜀王国祭祀重器	118
三星堆、金沙遗址考古大事记	215
编后记	219



序〔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也是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一周年，在全国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接国庆大典前夕，在四川人民万众一心全力重建美好家园之际，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深圳市文物局、成都市文化局、广汉市文物管理局联合主办，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院、深圳博物馆联合承办的《神秘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展》在深圳博物馆隆重开幕，这既是古蜀瑰宝首次在深圳亮相，也是深圳文化发展方面值得庆贺的一件盛事。

四川简称为“蜀”。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天府之国”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栖息的沃土，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两座祭祀坑的发现和2001年成都市西区金沙遗址的发现，震惊了天下，遗址中所发现的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具有强烈东方色彩的青铜雕像，以及大批精美金器和玉器的古蜀文物，还有众多的古城墙、宫殿基址、古祭祀礼仪中心残迹、墓葬等，证明了三四千年前的成都平原已有可以和中原商周文明相媲美的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也证实了长久以来关于古蜀王国的传说应该是信史。

此次展览，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博物院共精选了156件有代表性的文物珍品，其中一级品达77件。展品中的青铜纵目大面具、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鸟锋玉戈、大玉璋、金人面像、金蛙形器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稀世珍宝。这些珍宝从各个方面展示出古蜀王国社会的神秘和精彩斑斓。深圳市民这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古蜀瑰宝，必将加深对四川的感情，也将充分领略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和多样性。

我谨代表深圳博物馆的同仁向三星堆博物馆和成都博物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并预祝《神秘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展》取得圆满成功！

深圳博物馆馆长 杨耀林
2009年4月



序〔二〕

由深圳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成都博物院联合举办的《神秘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展》即将在深圳博物馆正式展出。值此展览图录付梓之际，我谨代表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研究院、广汉市文物局对本次展览表示热烈祝贺！向为此次展览诸项事务付出艰辛劳动的诸位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素享“天府之国”的美誉。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曾是古蜀王国中心。古蜀史悠久邈远，但因汉晋文献的记载语寡而恢诞，遂使之犹云遮玉垒，令人稽考无凭，难明其本来面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为廓清古蜀史迷雾，几代考古学人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探索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和金沙村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有力地叩开了古蜀历史之门，在很大程度上揭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面纱，深刻抉示出古蜀实具悠久始源、独特文化模式和文化类型，充分证明古蜀文化是中国古代区系文化中具有显著地域政治特征和鲜明文化特色的典型代表，以成都平原为重心的巴蜀地区是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和中国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村遗址是相距仅38公里的大型都城遗址，二者兴废年代前后紧密衔接，两处遗址有很多相同文化现象和大量相似文物，证明二者同为古蜀王国的中心遗址。“三星堆”与“金沙”前后辉映，共同构成了长江上游文明的灿烂图景。作为古蜀文化的结晶，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品类丰富且意匠不凡，营构出一个光华普照、神秘梦幻的信仰世界，谱写下一首雄浑阔丽的华阳神曲。

今年，欣逢新中国60周年华诞，我们特联合举办荟萃三星堆、金沙文物菁华的展览，旨在通过这批稀世之珍反映古蜀人的信仰、礼仪及艺术，揭示古蜀文明的内涵与特色，弘扬中华文化，向广大民众提供集中欣赏古代蜀国艺术瑰宝的良机，达到为社会为民众提供更多精神产品之目的。

衷心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广汉市文物局局长 张跃辉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

2009年4月



序〔三〕

美丽富饶的成都平原自古就是人类生活的沃土，然而关于它悠久的历史却正如唐朝大诗人李白描述的那样：“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古蜀国的面貌一直笼罩在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里，要真实地还原这段历史，就成为几代考古人孜孜不倦、苦苦追求的梦想。

上世纪20年代末，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在三星堆偶然发现了大量的玉石器，撩起了古蜀文明神秘面纱的一角。80年代中期，三星堆遗址的数次发掘，特别是两个祭祀坑的发现，使世人认识到古蜀文明原是如此的辉煌灿烂。1996年以后，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以宝墩遗址为代表的8座史前古城址群，让世人知道了三星堆之前成都平原远古文化的面貌；而2000年发现的商业街船棺合葬墓则把传说中的开明王朝遗存呈现在世人面前。2001年，当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过，成都市区西北发现的金沙遗址再次引起世人关注。宝墩文化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和古蜀船棺遗址，共同构成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大阶段，同时也再次证明了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学说提供了重要佐证。

作为金沙遗址的发掘者，我们一直沉浸在发掘的惊喜与震撼之中。2001年发现的金沙遗址祭祀区，面积约15000平方米，在发掘不到总面积十分之一的情况下，就出土了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野猪獠牙、鹿角等，使我们相信这里还会有更惊人的发现。我们还在金沙遗址发掘了多处生活居址，发现的房址、水井、陶窑、灰坑等，让我们了解到金沙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大型墓地的发现，让我们对金沙时期的丧葬习俗有了认识；发现的三处大型建筑基址时代相当，位置毗邻，建筑走向一致，共同构成一个大型建筑群，应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寻找的金沙王国最高统治者留下的宫殿遗迹。数年来大面积地勘探与发掘，使我们对金沙遗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遗址分布范围广，面积在5平方公里以上；延续时间长，从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金沙遗址与三星堆有着密切的联系，应是三星堆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从遗址的规模和遗物的等级分析，金沙遗址极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落后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

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明的内涵与外延，对研究古蜀文明发展演进历程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正因为如此，金沙遗址被誉为21世纪初我国第一个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金沙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还与三星堆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一起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7年4月，占地面积456亩的金沙遗址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深圳作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在30年快速发展中迅速崛起，实现了从边陲小镇到现代化大都市的历史性腾飞，并形成展示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和独特人文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因此藉此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特与深圳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合作，联袂推出以《神秘的古蜀王国——三星堆·金沙文物珍宝展》为主题的专题展览，旨在弘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宣传展示神奇灿烂的古蜀文明。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部分精美文物，在这些展品中，不乏第一次走出博物馆的古蜀奇珍。希望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分享考古发掘的无限惊喜，品鉴古蜀文化的神奇珍宝，领略古蜀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四川，走进成都，走进金沙遗址博物馆。

衷心预祝展览圆满成功！

成都博物院院长 王毅
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

2009年4月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发掘与研究

雷雨

壹、发现、发掘经过简述

1929年春，广汉农民燕道成、燕青保父子在广汉月亮湾车水挖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一时间，“广汉玉器”声名鹊起，燕家父子未曾想到，他们已无意中碰醒了沉睡数千年的三星堆文明，从而拉开了持续近八十年的三星堆考古的序幕。

三星堆遗址发掘时间之长，出土遗物之丰富，在中国除了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遗址外，恐怕没有哪个遗址可以与之相比了。近八十年间，三星堆考古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

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1934年，华西协成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加拿大人，美籍教授）和副馆长林名均等人在1929年玉石器坑出土地点附近进行三星堆历史上的首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百余平方米，出土、采集了六百余件玉石器和陶器。1936年，葛维汉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会志》第6卷上发表《汉州发掘最初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1942年，林名均在《说文月刊》第3卷7期上发表《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发掘》。这次被郭沫若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的发掘研究工作，对三星堆玉石器坑及其附近遗存的出土情形、地层、时代、性质作了初步的探讨，提出这批遗存的年代上限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下限为周代初期，并认识到“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过文化接触”（郭沫若语）。1946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郑德坤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发表辟有《广汉文化》专章的《四川古代文化史》，使“广汉文化”见诸于世。

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文博单位在三星堆遗址进行多次调查并进行了小规模试掘，发现月亮湾地点和三星堆地点都有古文化遗存，出土、采集到一批玉石器、青铜器、骨器和陶器标本，进一步弄清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四川省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和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根据三星堆遗址历年来出土的玉石器、半成品和石坯，首次提出手工业作坊就在遗址范围以内。1958年，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学家王家佑、江甸潮在《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上发表调查报告《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1963年，冯汉骥先生选定三星堆遗址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首届学生考古发掘实习的地点，进行了面积约15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工作。当年冯先生曾站在月亮湾的台地上，遥指对面的三星堆（特指遗址内的三个黄土堆，它与北面犹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隔着古老的马牧河南北相望，“三星伴月”由此得名，并在很早以前就成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后来的发掘证实，这三个土堆实际上是一道长条形的城墙遭后期人类活动破坏后形成的三个堆子），很有预见地指出：“这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三星堆考古因“文革”陷于停顿。

三、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从1980年起，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及四川大学、广汉文物保护管理所等单位在三星堆遗址进行了连续二十五年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正式命名了三星堆遗址，确立了三星堆文化。二十五年间，几代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北、中共7个发掘区进行了14次正式发掘，发掘面积近9000平方米，确定了遗址的东、西、南三道外廓城墙和月亮湾、三星堆等地点的内城墙，发现了“祭祀坑”、大型居住区和公共墓地，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一个湮没近五千年的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已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贰、延续时间最长的蜀文化遗址，四川盆地

4800~26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年代标尺

一、年代与分期

三星堆遗址近八十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是80年代以来历次科学发掘所获得的有明确地层关系的实物资料和C-14测年标本，使我们可以较为科学、准确地判定三星堆遗址的年代。

可以确定，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范围大约在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600年之间，前后不间断地延续了2200年左右，跨越了中国历史上的龙山时代（新石器时代）、夏代、商代、西周和春秋五个时代。

在四川盆地及周边地区，目前可以认定为蜀文化遗址或含有蜀文化遗存的古遗址有数十处，但每个单个遗址的延续时间均未超过一千年，因此可以说，三星堆遗址为四川盆地4800~26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

三星堆文化2200年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期文化遗存：遍布于整个三星堆遗址，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纹饰陶发达，纹饰种类丰富，器类以花边口沿器、宽沿器、大翻领器、圈足器和平底器居多，器形有宽沿平底尊、盘口圈足尊、花边口深腹罐、喇叭口高领罐、绳纹花边罐、镂孔圈足豆等；石器以小型的斧、镑、凿为主，房屋有干栏式和沟槽加柱式等种，建筑密集，并有大型建筑出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四川盆地一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绝对年代距今约4800~4000年之间。

第二期文化遗存：分布很广，各次发掘地点大多有相应地层发现。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明显减少，多为素面陶，纹饰数量和种类明显减少，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贝纹、云雷纹等，器形除保留有部分绳纹花边罐、喇叭口高领罐、窄折沿盆外，已不见花边口深腹罐、宽沿尊、折沿圈足尊、盘口圈足尊等第一期文化的典型器物，但新出现一组器物，主要有敛口圈足瓮、深腹罐、高柄豆、高圈足盘、尊形器、圈顶器盖、盃、鸟头柄器、坩埚等；玉石器仍多斧、镑、凿等小型工具，但也发现石琮、石璧、石矛、石钺以及玉锥形器等礼器，还出现青铜器如兽面纹铜牌饰和铜虎等，这一时期三星





堆遗址开始修筑城墙，并出现了一些埋存宗教礼仪性器物的祭祀坑，房屋发现有木骨泥墙的成组建筑和大型建筑构件。本期年代相当于夏代至商代早期，绝对年代距今约4000~3600年。

第三期文化遗存：遍布于整个三星堆遗址群，文化内涵特别丰富。陶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陶、纹饰陶比例进一步下降，纹饰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三星堆文化的典型陶器群发展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小平底罐、高柄豆、鸟头形器柄、盃等器物的数量和类型大增，新出现三袋足甗形器、觚形器、厚唇侈口缸、矮领瓮、瓶等一组器物；本期出现大批青铜神器、礼器、金器和玉石礼器，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又一重要特色；这一时期三星堆古城建成，房屋建筑密集，有宫殿般的大型建筑物出现，年代相当于商代早期至商代中晚期，绝对年代距今约3600~3200年。

第四期文化遗存：此期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缩小，堆积较薄，并且逐步消失，遗迹现象中最突出的是发现了两个埋存礼仪性器物的大型“祭祀坑”，同时三星堆古城废弃。夹砂陶仍占大宗，但泥质灰陶重新增多，素面陶比例增大，绳纹、凹弦纹成为主要纹饰；在原有器形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组新的器物，如薄胎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器座、高领罐（壶）、矮圈足罐等；石器仍多斧、锛、凿等小型工具，发现有跪坐石人像，新出现柳叶铜剑，时代约相当于商代末期至春秋早期，绝对年代距今约3200~2600年。

以上四期文化遗存的文化内涵既有相当大的差别，又相互连接，存在着强烈的承袭因素，它们自成体系，地域特征鲜明，是同一文化系统——三星堆文化不同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物质文化面貌的具体表现，从三星堆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时代范围以及文化遗存反映出来的相应的社会发展阶段观察，可以肯定它就是古代蜀人的历史遗存。

在三星堆文化确立之前，四川地区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尚不清楚，正是由于三星堆遗址前后近八十年间、尤其是自1980年以后的不断发掘，在该遗址确立了4800~2600年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后，才随之在四川各地又发现和认识了诸如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十二桥遗址、金沙遗址、雅安沙溪遗址以及三峡地区的哨棚嘴遗址、中坝遗址等一批相关的遗址，由此基本上展现和建立了四川地区乃至长江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面貌及发展序列框架。

叁、夏商时期的蜀国王都遗址

一、分布面积最广的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长江水系沱江支流的鸭子河南岸。根据目前的调查，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鸭子河支流）两侧高台地上，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是古蜀文化遗址中最大最为重要的一处中心遗址。

二、中国南部最大的夏商古城

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发现在三星堆遗址的东、西、南三面及中北部均分布着五道长条形的高土埂，怀疑为人工建筑遗迹。从1984年起，开始对这些土埂进行正式的调查和试掘，逐步认识到它们是城墙建筑的遗存。1989年~2000年，先后在南土埂、东土埂、西土埂、三星堆土埂和月亮湾土埂进行了七次正式发掘，证实了这些土埂均为人工构筑的城墙，墙体建筑使用了堆土拍夯、平夯、砖坯砌筑、切削为壁等多种方法，城墙外侧还分别掘有壕沟。

从现存城墙的布局推断，三星堆古城由一道外廓城（大城）和若干个内廓城（小城）组成。外廓城平面大致呈方形，边长约1800~2000米，由东、西、南三面墙体组成，墙外有城壕，北部没发现城墙，可能已被鸭子河冲毁，也可能是以水为墙。内廓城（小城）的确切数目、确切位置、大小和功能目前还不清楚，但从三星堆城墙和月亮湾城墙等外廓城以内的小城墙的走向、拐角、壕沟，以及它们与外廓城城墙、与穿城而过的马牧河的关系等因素考虑，外廓城内存在着多个小城这一点是大致可以肯定的。外廓城三面城墙并未闭合连接，可能与洪水和后期人类活动破坏有关；也可能当时就未封闭，联系到各城墙墙体宽度与夯筑方法也不大一致，可能系早期壅土为城的原始筑城特征之反映。但从其布局、规模、筑法、结构看，可以确认为城墙无疑。从地层叠压关系和各地层中的遗物分析看，各道城墙均大致始筑于三星堆二期文化早、中期（夏、商时期），大致废弃于三星堆四期文化早段（商代末期），延续使用近千年。城内面积约3.7平方公里，与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不相上下，在中国已发现的同时期古城遗址中，其规模名列前茅。

三、密集的居住区和众多的文化遗迹

在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分布着密集的房屋建筑和其他文化遗迹，房基层层叠压、打破，说明当时人们的活动极其频繁，同时也是三星堆遗址上下延续2200年历史的具体反映。房屋形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和组合式房基等多种，以沟槽基础、木骨泥墙、榫构梁架的木构房屋为主，颇具地方特色；同时还有干栏式架空小屋等建筑形式；不仅有平民居住的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房舍，而且有显贵居住的面积超过60平方米的穿斗结构大房舍和抬梁式厅堂；最大的房间面积超过250平方米，数间连成一组，其功能已超过一般居室的需要，可能是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近年来的调查和发掘表明，在三星堆遗址北部、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的高台地区域已有夏、商时期的大型宫殿性建筑存在的征兆。

遗址中除房屋建筑遗迹外，还有作坊、窑址、墓地、器物坑、祭祀坑、灰坑、灰沟等各类遗迹，反映出多样的生产、生活活动和复杂的社会分工，遗址内居住区、作坊区、墓葬区等分布有序，说明三星堆古城已初具设计和规划的理念。

四、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文化遗物

自1929年以来，三星堆遗址已出土各类文物数万件。其中，青铜器九百余件；玉石





礼器一千多件；金器数十件；石器数千件；以及大量的陶器(标本约3万件，可复原者上千件)和骨器、海贝、象牙等。数量和种类如此众多和丰富的文化遗物出自同一个遗址，实属罕见。

五、最高规格的蜀文化遗存——一、二号“祭祀坑”

著名的一、二号“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城墙东南50余米处，是三星堆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亦是知名度最高的三星堆文化遗存。两坑形成（亦即坑内器物下埋）的年代大体与三星堆古城的废弃年代相同，为三星堆四期文化早段（商代末期），而坑内器物的制造和使用年代绝大多数为三星堆三期文化晚段（商代中晚期）。坑室内器物的埋藏现象前所未见，大多数器物理藏时或埋藏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发黑、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而散落在坑中不同的位置，部分青铜器的外表还涂有朱色颜料，但所有器物均分层、有序放置，表面这些器物是在经过某种特殊的仪式后再下埋的，因此一批学者认为，两坑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祭祀坑，尽管坑内器物均系祭祀用器或相关器物，但两坑本身的形成并不是祭祀活动所致，而极有可能与蜀国历史上发生的突发性重大事件有关。

一号坑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海贝、骨器、陶器等各类器物近600件，以及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二号坑共出土金器、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象牙器、海贝、绿松石等各类遗物6000余件（片）。两坑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商时期常见的青铜容（礼）器、玉石器和商末周初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两坑器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不少器物形体巨大，形制复杂，具有强烈的视觉震撼力，充分反映了商代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宗教信仰和宇宙观。经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鉴定，两个“祭祀坑”中仅“国宝级”（中国文物鉴定级别中的最高等级）的文物就有6件，一级文物达数十件。一、二号“祭祀坑”既是整个三星堆遗址的精华所在，同时又代表了古蜀文明的最高成就，它们的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蜀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必将引起人们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历程的重新审视，从而成为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以及历史、民族、宗教、艺术等多门学科研究的热点。

在三星堆遗址发现规模宏大的古城以及大范围居住址、出土大量高规格精品文物的同时，在其周围方圆数十里的地域还分布着数十座与三星堆遗址某一阶段或某些阶段文化面貌相同的中小遗址，从而共同组成了一个分布广泛、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由此可见，这个文化区域实际上所代表的是一个由中心城邑、一般邑聚和村落等社会形态与政治结构所构成的有机的社会体系，而处在该文化区域中心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城邑三星堆遗址，应当就是这个社会体系的核心——蜀国都邑。

肆、长江流域最辉煌、最独特的青铜文明，浓郁的神巫文化特征

三星堆遗址，尤其是震惊世界的两个“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和特殊文物，数量、种类之多，形体之大，造型之奇，文化内涵之丰富、神秘，前所未见，代表了当时甚至相当长时期内人类艺术与技术的巨大成就，当之无愧地成为长江流域最辉煌、最独特的青铜文明，也是中国青铜文明鼎盛时期的杰出代表之一。

三星堆遗址文物埋藏丰富，尤以青铜制品数量巨大，除少量青铜礼器器形与二里头、殷墟文化同类器相似外，大部分器形如青铜神树群、青铜人像群、青铜面具群等尚属首次发现，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显示出许多独特的不可比拟性，充分反映了商代蜀人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

三星堆文化青铜器以人像、面具、神树、太阳、动物、禽鸟等为表现主体，这与中原地区商文化青铜器以器物（主要是礼器）为表现主体的传统截然不同，其神巫和神权色彩更为浓郁和突出，当是三星堆文化的内核和精髓所在。

有学者认为，与其他区域文明相比，三星堆文化特质显然迥异于中原商文化，就目前的认识而言，两个“祭祀坑”似乎传达出了在三星堆文化中王权与神权并存的信息。具体而言，一号坑中以青铜人头像为主的各类器物可能出自宗庙，反映的是祖先崇拜，金杖则可能为王权的表现；而二号坑中的青铜人像及神树、太阳形器、神坛、神殿等具神话色彩的器物则可能出自神庙，表现的或许是太阳崇拜，而在中原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中并无类似的太阳崇拜和相应的神庙。因此三星堆文化在显示出其独特面貌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文明，再一次证明了华夏文明形成的多样性。

同时，一些中国古代传统礼器如玉牙璋、铜尊的用途及其在祭祀仪式中的具体用法，也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玉璋上的雕刻图案、持璋铜人像、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上找到了部分答案，这为研究商代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伍、地域特征占主导地位多元复合型文化面貌

如果仅仅以两坑集中出土的特殊器物来认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未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只有对整个遗址出土的包括陶器、石器普通生产生活用具在内的所有文化遗物进行全面考察和研究，才能够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科学认识。这样，两个“祭祀坑”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就不至于有那么多的人们把三星堆看成是神秘外来的，甚至有的认为是天外来的文化，使其自然而然地能够理解三星堆文化以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根据目前的研究，三星堆文化包括以下几大文化因素：

一、土著文化因素：包括绝大多数陶器、石器；玉器中的鱼嘴形璋、鸟形璋、斧、斤、凿、斨、柳叶剑；铜器中的柳叶剑、瑗、戚形璧、带齿戈等，其中陶器和石器是整个三星堆遗址出土数量最多、使用最广泛的文化遗物，约占所有出土遗物的90%以上。





二、仅见于蜀地，来源暂时不明的文化因素：金杖、金面罩、金箔动物、各种青铜人像、人头像、面具、眼形器、太阳形器、“神坛”、“神殿”、神树、花鸟、果实、禽兽等。

三、中原夏文化因素：青铜牌饰、铜铃，陶盃，玉边璋、牙璋、牙璧形器等。

四、中原商文化因素：青铜尊、鬲、盘、甗、“将军盔”，玉戈、玉边璋、牙璋、玉琮、玉璧、玉环、玉瑗等。

五、长江中下游文化因素：少量陶器，玉琮、玉锥形器等。

可以认为，三星堆文化是一支具有强烈地方色彩并吸取了其他地区文化因素的复合型文化，土著文化因素自始至终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陆、三星堆、金沙与传说中的蜀王世系

大约从三星堆四期文化早段开始（商代晚期），虽然在三星堆遗址范围内不少区域还存在着以尖底器、高领器、矮圈足器等系列陶器群为主体的文化堆积，延续时间也较长，但象征三星堆文明最高成就的三星堆古城、铜器群、金器群和玉石器群等却突遭废弃或从此不见踪影，三星堆遗址由此进入衰退期，与此同时，一支与三星堆四期文化同时、且完全从三星堆三期文化脱胎发展而来、发达程度仅次于三星堆繁盛时期的文化遗存却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地域悄然兴起并广泛发展，时间从商代晚期延续至春秋早期，形成了长江上游文明在成都平原继续发展的历程，其中发达程度稍逊于三星堆的金沙遗址无疑是这一时期的中心遗址。

金沙遗址发现于2001年，位于成都市区西部，现已探明的分布面积约5平方公里，已发现宫殿区、祭祀区、生活居住区、墓地等众多文化遗迹或遗迹区，遗址规模仅次于三星堆，是成都地区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周遗址。

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已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等共计3000余件，还有数以万计的陶器（片）。

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无论是器物组合还是单个器物的造型风格，都与三星堆遗址的同类器相似或相同，亦具有浓郁的神巫文化和神权特征，说明“金沙人”在政权架构、宗教信仰、拜祭对象、审美意识以及宇宙观等深层次的精神领域与“三星堆人”有着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金沙出土的遗迹和遗物表明，金沙遗址绝非一般的聚落遗址或低层级城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长江上游地区继三星堆遗址衰落后形成的又一个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新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它与三星堆四期文化遗存一道，共同构成了成都平原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文化——三星堆四期文化，代表了古蜀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不少学者认为，自发生导致三星堆古城废弃和两个“祭祀坑”形成的突发性重大事件以后（一、二号“祭祀坑”可能为三星堆政权逃难前匆匆掩埋所致），蜀国的权力中心很可能从广汉转移到成都市区来了，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金沙遗址很可能就

是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古蜀国的都城遗址。

但与三星堆遗址相比，金沙遗址明显缺少青铜群像（神像、人像、巫师像、神灵动物像等）、青铜神树、青铜太阳形器、青铜眼睛（眼形器）等大型青铜重器群，即使有（如青铜立人像），在体量和视觉震撼力上与三星堆遗址同类器也不可同日而语，表明三星堆文明发展到这一阶段已进入相对衰落阶段，蜀国的国力已大不如前。

三星堆遗址从距今4800~2600年连续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制社会的鼎盛时期，从原始社会解体到方国、王国阶段，可以说是一部虽较朦胧但也较完整的早期蜀国信史。

古史传说记载，蜀人的远祖出自黄帝，古蜀国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代蜀王。《蜀王本纪》云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望帝（杜宇）积百余岁”；开明氏取代杜宇氏以后，其统治时间最长，传位至十二世，公元前316年，在秦取巴蜀的战争中，开明十二世被秦军所灭，蜀国宣告灭亡。

第一代蜀王叫蚕丛，《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他最大的功绩是教民种桑养蚕；第二代蜀王名叫柏灌，关于他的具体记载几乎没有，只知道“柏灌”是一种水鸟；第三代蜀王叫鱼凫；“凫”就是鱼鹰；第四代蜀王叫杜宇，杜宇就是杜鹃鸟。相传杜宇“教民务农”，备受爱戴，但却无力治理蜀地的水患，而来自川东荆楚地区的开明氏，由于治理了水患，受到人民的拥戴，取代了杜宇而成为第五代蜀王。

根据对传说中的历代蜀王在位时间以及蜀王名称、形象和图腾的研究，结合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器物，如三星堆二、三、四期文化发现的大量的鸟的造型，纵目面具等，多数研究者推测，三星堆遗址各期文化遗存与传说中的蜀王世系大致对应如下：

1. 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遗存——蚕丛王朝，政治中心或之一
2. 三星堆遗址二期文化遗存——柏灌王朝，政治中心
3. 三星堆遗址三期文化遗存——鱼凫王朝，政治中心
4. 三星堆遗址四期文化遗存——杜宇王朝，政治中心在金沙遗址





古蜀都邑 —— 金沙遗址

——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朱章义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著名浪漫主义诗篇《蜀道难》中的诗句，也是古人对古代蜀国历史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流传了数千年，但随着近年成都平原不断涌现的考古大发现，人们正逐步改变原有的看法。特别是1986年三星堆遗址二个祭祀坑的发现，古代蜀国的历史和光辉灿烂的文明，正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人们在惊叹古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又产生了种种谜团，三星堆文明来自那里，又去向何方？

当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在距三星堆遗址仅30余公里的成都，发现了又一个三星堆——金沙遗址^①，出土了数千件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其中的很多文物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似，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21世纪初中国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它也当之无愧地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一、遗址概况

成都平原位于四川盆地西部，是四川唯一较大的平原，它是由岷江、沱江及其支流流出山口的冲击扇连接而成的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这里土壤肥沃，河流密布，终年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华阳国志·蜀志》在描述成都平原环境时说：“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早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诸葛亮在流传千载、脍炙人口的《隆中对》中又说“益州（汉代成都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成帝业”（《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远古文化的繁盛提供了物质基础。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平原腹地的成都市市区西部，介于西二、三环路之间，摸底河由西向东横穿遗址。遗址内地势平坦，遗址北侧的郫江故道两岸，发现了抚琴小区^②、十二桥^③、方池街^④、君平街、指挥街^⑤、岷山饭店、岷江小区^⑥等商周时期遗址，金沙遗址是这些遗址中规模最大，遗迹和遗物最丰富的遗址。早在1995年12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金沙遗址范围内的黄忠村发现了商周时期文化堆积，发现了大量的遗迹和遗物，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后，我们在黄忠村不断发现重要遗迹和遗物，特别是2000年在“三和花园”基建工地发现一处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基址，布局十分有规律，绝非一般的村落遗址。所以，我们一直把这一区域作为考古工作的重点，一直期待着重大考古的来临。这样的期待在新世纪的2月8日变成了现实。在“三和花园”大型建筑基址南侧约800米的金沙村，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在施工中意外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造型精美、风格独特的珍贵文物，超越时空的阻隔，将沉睡了三千多年的金沙文明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令人叹为观止，从此翻开了金沙遗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的新篇章。

我们首先对机械开挖出的泥土进行了仔细的清理，共清理出金器、铜器、玉器、

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1300多件，如神面纹玉琮、金冠带、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饰、石人、石虎等都是在这些散土中清理出来的。随后对出土玉石器、铜器、象牙的地点进行发掘，又出土了各类文物5000余件，初步确认这一区域是金沙时期的一处专用祭祀场所，是金沙遗址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其次，我们对摸底河两岸的金沙、黄忠、龙咀、红色、朗家等村进行了全面的文物勘探和试掘，确定遗址的分布范围、面积，为遗址的保护打下了基础。此后，在配合基本建设中，我们年年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达20万平方米，我们对遗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通过长达八年不间断的文物勘探、发掘和初步研究，我们确定了遗址主要分布在青羊区的金沙村、龙咀村和金牛区的黄忠村、红色村、郎家村，东临青羊大道，南近清江路，北过羊西线，西越三环路，面积逾5平方公里；初步确定了遗址的功能分区，大型建筑基址区与祭祀区一北一南，间距约800米，一般居住区、墓地等散布其间；根据出土的各类文物，特别是对陶器组合及演变的研究，结合C-14测定数据，我们认为金沙遗址的年代上限当在商代晚期，其下限可至春秋早期，主体文化遗存的年代当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金沙遗址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古蜀文化中心遗址，是广汉三星堆遗址衰落之后的在成都平原兴起的又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古蜀国在这一时期的都邑。

二、遗迹

金沙遗址遗迹极其丰富，目前已发现5000余个遗迹单位，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大型房屋建筑基址、祭祀区和大型墓地。

大型建筑基址位于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三和花园”地点、“城乡一体化5号地块”和“金沙朗寓”地点。三和花园地点发掘面积2026平方米，发现17座房址，其中F5、F6、F7、F8、F9为一组建筑，因发掘场地限制，F5、F6、F9未发掘完毕，但可以确认为大型排房。这组建筑基址布局十分规整，F6居北，F5、F9分列东西两侧，F7、F8居于F5、F9之间，呈方形。其中又以F6面积最大，长54.8米（西侧未发掘完毕），宽约8米，面积超过430平方米，F6内发现5条隔墙，是一座至少有六开间的大排房。房屋的修建也相当考究，墙体是挖基槽埋柱子的木骨泥墙式结构；基槽宽约0.5米，槽内大、小柱洞排列规整；小柱洞较密集，大柱洞间相距约1.4~1.5米。2007年和2008年又在其周边发现了5座大型排房，特别是F160、F161还是带廊柱的大型排房。这些大型排房基址应是一组建筑群，面积约4000平方米，很可能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

祭祀区位于遗址的东南部，隔摸底河与大型建筑基址相望，是一个长期使用的专用祭祀场所，也是一处滨河祭祀场所，它规模宏大，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面积约15000平方米；延续时间较长，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这里祭祀遗迹之集中，祭祀用品之丰富，种类之广，做工之精，规格之高，在考古发掘中都是十分罕见的。

